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公物迁运 复员北上的回忆

○申泮文（1940届联大，化学）

申泮文（1916—2017），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为南开大学教授。

一、三校公物联合迁运北上任务概况

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1946年5月1日正式宣布结业，是日上午9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北院图书馆举行了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都恢复本校建制。按原计划三校自5月10日开始向平津迁移，但是由于事态之繁复，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迟至7月3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才宣告本大学结束。自筹备复员北迁之日起至三校在平津复员建校上课当中的一段历程，可以说是由联大到独立三校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中的工作有分有合。分的是三校各按自己的建制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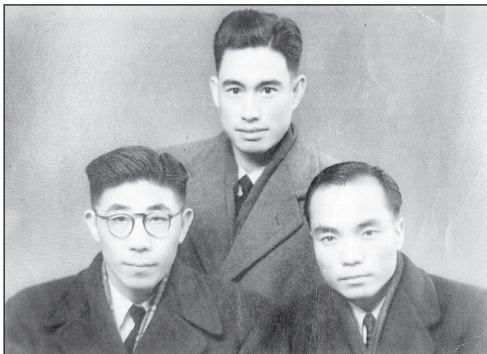
独立职能，如制定各自的复校规划等；合的是所有复员部署均采取联合行动，例如三校师生复员北上的旅程安排、沿途接待和辗转等组织工作，又如三校公物的联合迁运复员北上等。因为由昆明至平津，旅途遥远、交通险阻、江山残破，造成工作效率迟缓，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人为困难重重，使得此复员过渡时期竟延迟到1947年7月始克竟全功。而此时三校都各在平津上课一学年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史资料》和《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中，对这一段中间过渡均无所记载，而且事过境迁，一般校友对这一段经历亦鲜有所知。本人自始至终参与了最后一批三校公物复员北上的联合迁运任务，历尽艰辛，与这一段过渡时期相始终。爰就个人回忆作一简录，供校友们参考。

为办理三校复员北迁任务，联大曾两次组织三大学联合迁运委员会。第一次是在1945年8月23日，校常委会通过设置以郑天挺教授为主席包括五位委员的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以后在1946年初陆续三次增聘郑华炽教授等5人、李继侗教授等3人和马大猷教授等12人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1946年5月26日委派徐彰为主任的五人押运小组负责将第一批急运的三校图书仪器物品69吨625箱运回平津，于8月底顺利地回到北方。

1946年7月25日，联大第二次组成三



一九三八年联大学生在昆明清华校舍，后排中为申泮文、右为王宪钊



1946年押运三校物资复员平津途中滞留长沙时留影，左为王大纯、中为申泮文、右疑为单溥

校联合迁运委员会，由三校分别推定的代表组成，包括贺麟、孙云铸（北大），霍秉权、沈履（清华），黄钰生、冯文潜（南开）等教授，以霍秉权为主任委员。根据三校推荐和协商决定，委派申泮文（南开）为主任押运员、王大纯（北大）和黄胜涛（清华）为副主任押运员，组成包括七人的押运小组，负责300吨公物北迁的任务。

这300吨公物分属三校，其中包括少量三校教职员的行李、书籍和衣物，大部分为图书仪器。如属于北大、南开的公物主要是图书；属于清华的主要是工科的仪器设备。公物都装在技工制造的一定大小的木箱里，私人物品则有行李包、衣箱、装书籍的木箱不等。

这批物资的运输路线是由昆明以载重汽车经滇黔湘公路运到长沙，在长沙雇用民船经湘江、洞庭湖转长江至武汉，在武汉装江轮顺长江而下运到上海，再在上海换海轮运到天津，最后将清华、北大的公物以火车运回北平，分别向所属学校交割。原计划三个半月完成迁运任务，谁知事不由人，屡出意外。整个迁运任务反

映了旧中国社会的一些侧面，人民多灾多难，给我们这几位天真少知的青年知识分子极为深刻的教育，也使我们加深了社会阅历，锻炼了工作能力。

这批公物的运输是在三校联合迁运委员会的主持下，包给裕和企业公司承运的。这家私商的性质就像是旧社会中的某种皮包公司，自己没有什么资本和运输工具，而是靠与三校联合迁运委员会（甲方）签订合同，由殷实商家或银行作担保，从甲方领取一大部分运费，然后再找第三方来分包。例如从昆明运出需要100部卡车，这就由许多小包商3部、5部卡车地分包了去，有的甚至是1车一包，零零星星，难以管理，由此造成从昆明出发一再延迟，以及扫尾工作难以完成。霍秉权主任委员向我们布置任务，我们按指示办事。我作为主任押运员的主要任务只是对公物扫尾殿后而已。

二、对昆明恋恋不舍

全部100辆汽车公物，分三批离开昆明。第一批在7月中旬动身，由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黄胜涛率领两位助手押运北上。他这一批公物比较顺利地回到平津。第二批约在9月中动身，由北大地质系助教王大纯负责，率领助手二人——北大图书馆职员单溥和清华事务科职员王树才共同押运。10月初抵达长沙，按计划他们要等我的最后一批公物到齐，集中装船北运。所以王大纯等三人和裕和公司代表陈毓善等在长沙停留，等候我和最后公物的到达。

我们三校押运人员的工作，首先是监督承包的卡车到联大留守仓库装车，给公物编号加写箱外标志或挂标签，登记装车单，然后招呼装好货的车辆驶离昆明，沿

途进行督促检查，防止失误。

裕和公司也派了三位雇用人员管理沿途运输、转运和押运任务。负责人叫陈毓善，是西南联大1942年毕业生。他是南开中学1937班毕业生，而我和王大纯恰好是南开中学1935班毕业生，按关系我们是他的学长。陈毓善在联大毕业后就留在昆明从事投机商业工作，沾染了一身旧社会商场习气。我和大纯常以同学老大哥的身份，在他表露出社会恶习时，就毫不客气给予批评，加以抑制。他碍于同学关系，只好顺从听话。由于这种合作甲方占有优势，所以运输途中，甲乙双方没有出现过大矛盾纠纷。即使对外出现尖锐问题，甲乙双方押运人员也能够同舟共济、紧密合作、维护共同利益，一致对外。这是有“校友”关系的一大好处，否则在我们后来遭遇到的重大事故中，事情会十分难办。

在我留在昆明做扫尾工作时，最后一些承包车辆零零散散姗姗到来，使我不得不翘首以待，天天在等装车和启运的消息。我那时还受学校委派，在南开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帮忙办结束收摊工作，把一切文件公物装箱空运。原工作人员赵子聘

（会计）和张志谕（注册课职员）离昆明北上后，就我一个人住在南开办事处空荡荡的院子里（最后离开时把全部家具交割给昆明师范学院）。后来索性搬到昆华师专院内联大公物仓库附近的宿舍里，办理最后扫尾。

由于承包运输的车主和司机大都不是正正派派的买卖人，有些人拿了承包款，不来拉货，甚至又去承揽别的货运，先跑别的运输去了，弄得我在最后两个多月里十分狼狈，又要盯着来车装货，又要跑裕和公司，批评他们不守信用，督促赶快派车启运，东跑西颠，收效甚微。我须乘最后一部卡车离昆明，而这最后一部车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拖延。我曾在昆明天祥中学教过课，教过的学生每次听说我要动身，都集合到昆明汽车车站等着送我，待听说走不成了又失望而回，这样空送竟达六七次之多，一直拖到12月初的一天才算最后成行。这样我在昆明整整滞留了半年，真好像是天公有意，给我机会来表达我对美丽春城的眷恋之情！而昆明天祥中学同学对我依依难舍的师生情谊，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6年申洋文（2排左4）告别昆明前和他教过的昆明天祥中学学生合影留念

三、昆明至长沙

昆明至长沙，公路旅程约1500公里，路途险阻，卡车如好好行路，一个星期便可走毕全程。由于司机人员常常不好好运行，走走停停，走完全程到长沙约用了十天时间，所以我在1946年12月中旬才到达长沙。

我这一行共有3部车，每车有一司机和一助手，还有一位是这3部车的车主，我就便带了一位天祥中学高二学生黄庆华，他课业拔尖，中学未

□ 回忆录

毕业就破格考取了清华大学，须北上就学。我利用当时手上那一点权力，免费带他到长沙，旅途我也有个伴，不致寂寞。

沿途上这位汽车主调皮捣蛋，一路诉穷要我借钱给他维持开销，我当即严词拒绝。这位车主也狡猾，看动摇不了我，就看中黄庆华一个中学生心软可欺，趁我不在场时向黄庆华借钱。黄听说他无钱吃饭怕误了行程，就借给他几十元钱。我告诫黄庆华，出门在外不要轻信花言巧语。车主没钱是假，想挤我们给他出血是真，名为借钱，靠他自觉偿还是没有指望的。但我又安慰黄庆华不要担心，到长沙时裕和公司还要付给车主最后一笔运费，到时我可通知裕和扣回借款，不能让车主诈骗得逞。到了长沙后，裕和陈毓善来接我，我当即责成他扣回车主向黄庆华借的钱，当着车主的面偿还给黄庆华。翌日就把黄庆华送走乘火车去北平上学去了。后来黄庆华在清华学习优秀，毕业后工作中亦屡有成就。

从昆明至长沙，一路总算平安无事。但到长沙与王大纯、陈毓善会面，就听到他们向我汇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给我们在长沙滞留一冬拉开了惊险的帷幕。

四、蒙受不白之冤

王大纯、单溥和王树才比我早到长沙一个多月，王大纯为了安静，寄住在长沙一路吉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中。单、王二人则嫌青年会规则严谨，不自在，住在外面的自福旅社。我到了之后，就住进青年会宿舍316号。为了严谨，我以主任押运员身份建议单、王二人也搬入青年会，无奈他们不同意，我也不便强求，这也给后来造成悲剧伏下了祸根。裕和公司在长沙租用了一处民房，陈毓善等三人住在那



申洋文押运三校物资
复员平津途中在长沙

里，不过陈毓善总来青年会找我和大纯一道搭伙去吃饭。整个冬天三人常在一起计议工作和聊天。我想在这一时期，我们二人对陈毓善是起了良好影响作用的。

一到长沙，王大纯和陈毓善就向我报告，在我到长沙的前一天傍晚，有一部装运三校公物的卡车被长沙军宪警联合督察处扣留，从车上搜出藏在公物箱中私运的鸦片烟土。司机及其老婆孩子均被扣押，但司机当天又藉故逃跑，丢下老婆孩子在关押处所。该督察处（实际是一个变相的特务机构）规定，要在次日上午全部开箱查验，着三校和裕和公司的负责人亲临现场会同检查。

根据该督察处一位特工人员所说，原来在昆明贩卖鸦片的人与长沙的“缉毒”人员是互通信息的，有“警官与小偷”之间的联盟。所以长沙督察处截获此卡车后，毫不费力就把鸦片起出。根据我们的分析，司机并不是逃跑的，而是由特工人员卖放了的，老婆孩子纯属无辜，早晚要放。鸦片已经搜出，本无必要再搜查其他箱物品，硬要搜查，是对我们进行威胁，别有用心。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此严峻现实。

次日清晨，申、王、陈三人去督察处，会见了一位姓沈的督察长，听取了情况，原来这车公物全部都是北京大学教职员交运的行李。搜出藏有鸦片的一个中型皮箱，属于北大历史系的一位教师所有，内部所装都是手抄藏经，想必十分珍贵。在此箱中搜出的鸦片已“上缴”，我们始终未见该赃物。那位沈督察长气势汹汹，态度粗暴，语言蛮横，对待我们很无礼。开箱搜查的人也动手野蛮，硬是打烂每箱的锁子或锁鼻，把箱内物品全部翻倒出来，再让我们逐箱收拾。当时我气涌心头，立即向沈督察长提出抗议，说这样打烂箱子，我们无法收拾，回去也无法向学校和同仁们交代。他大怒，反诬我抗拒检查，要着人扣押我。当时由陈毓善和王大纯好说歹说打了圆场，才算解围。后经我们软中有硬固执要求：暂停检查，明日我们请一位锁匠来开锁，买来绳索准备捆扎烂的箱子，再一一进行搜查不迟，以免私人行李受到更多损失。最后按我们要求达成协议。次日我们果然请到锁匠伴同前去，检查就比较顺利，很快完成。大概也是他们看我们并非软弱之辈，挤不出什么油水来之故。但他们并不放弃继续刁难，提出新的要求：一是要对我们在长沙存仓的全部公物逐箱检查；二是要对以后到来的每车公物，都要开箱检查。这时我们深感寄恶人篱下，无法拒绝，我们也无力量和经费去做任何打点买通关子的事情。所以后来在长沙滞留，日子确不好过。此时我们大概尚有二十几车公物未到，只好把棘手的事情责成裕和公司按承包责任去办，我们尽量做好监督协办工作，也帮不了更多的忙。

与督察处发生冲突的当天傍晚，三校

押运人员和裕和公司人员都聚在我所住青年会的宿舍中议论对策，突然来了两个年青人，自称是报馆记者。一个递过名片，头衔是湖南晚报记者，张口就提出要求，要我们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事情很明白，要敲竹杠。我当即递上主任押运员头衔的名片，把发生事情经过向他们作了简要叙述，并声明我们没有旅途办公费，歉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望谅解。这二人并不耐心听我的话，在受到婉言拒绝之后悻悻而去。当时我们确实很不懂得“无冕之王”加上“流氓”的厉害。

次日下午，《湖南晚报》以赫赫头条位置刊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公物卡车私运鸦片被查获的新闻，捏造事实说当该卡车被军宪警督察处截获施行检查时，押运员申泮文无理阻挠，态度蛮横，拒绝检查，结果在强行检查下，搜出私运鸦片，现人车俱已扣押云云。读了这段“新闻”，真叫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心里说不出的气和恨。但当时只蔑视这是野鸡小报敲诈不成、造谣中伤的伎俩，在思想上还不够重视。谁知第二天早晨长沙的几份大报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都以重要篇幅予以转载了。照此推想，以讹传讹，一定会在全国各地报纸转载。至此，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和大纯立即去几家报馆，向《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要求在显著版面（报头）刊登启示广告，竖行的上部是二号大字“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迁运委员会主任押运员申泮文王大纯启事”，下面四号字主文声明，《湖南晚报》所载新闻与事实不符。先说明私运鸦片汽车被扣日期在先，申泮文押运的汽车到长沙日期在后，两者不是一回事。其次声明私运鸦片

□ 回忆录

纯粹是司机所为，与三校人员无关。这个启事次日刊出，很有效，把在长沙出现的谣言立即平息掉了。

五、远方的影响

然而，报纸新闻的不胫而走，在远方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很多亲友都寄以忧虑和悬念。下面只记两件事。

一星期后，我接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邱宗岳先生的信，措辞很严厉，说见报载我们在长沙出了事，要求我急速向他作详细汇报。我当即连夜赶写了一封比较详细的汇报信，记得文字是文言白话两用（即语录体），洋洋数千言，介绍了事发经过和我们的对策，最后报告我们平安无事，请求信任和放心。信发后很快又得到邱先生复函，表示高兴和嘉勉。这里插一句补话，后来我返校后听同事们讲，我给邱先生的信收到了好效果，这大概是祸兮福所倚罢！邱先生夸奖我的信写得好，文字清爽，并且表明人很能干。从那时起我在邱先生头脑中留下了好印象，他决定等我回来以后让我担任系秘书的工作（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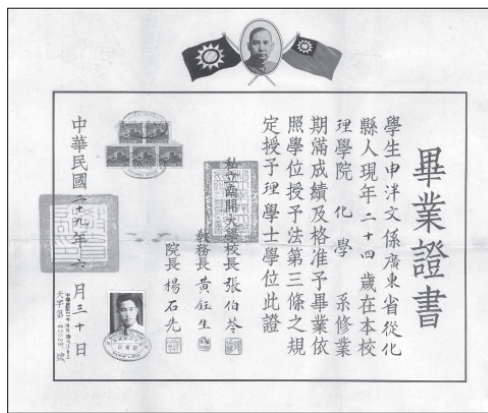
于系主任助理）。此是后话不提。

与邱先生信差不多同时，资源委员会驻长沙机构收到该会驻兰州机构的一封内部密电，请求帮助查找三校押运员申洋文的下落。经他们多方面探寻，电报送到青年会。原来我在资源委员会驻兰州西北运输处工作的哥哥，见到报载新闻，以为我已坐了班房，放心不下，通过资源委员会内部电报前来查询。接到这份密电又是一次啼笑皆非。因我的老父母均在兰州，只好战战兢兢赶快补写一封平安家信。幸而我的老父母都身体健康，他们也都是久经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受得住惊吓。如果是差池些的，就真会“谣言杀人”了。

六、孤立无援

我们本来对三校公物复员如此承包出去的方式十分不满，出现司机私运鸦片事件等于火上加油，促发了我们对三校联合迁运委员会的无名怒火，先后连续发出函电催促主任委员速来长沙，亲来处理这种棘手问题。但清华的霍秉权教授却很沉得住气，既不肯来，也不作任何答复。可能还是我们年轻气盛，不能体谅他当官做教授的苦衷，不予谅解，给他写信中不少批评意见，火药味很浓，要求他不要仅在北京“遥控”，而是应该身临现场，处理实际问题。但他是有涵养的，就是不来。

事过差不多两个多月之后，根本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位主任委员才姗姗来迟，乘飞机到长沙来看望我们，实际是来视察的，对我们既无慰问之意，更谈不上嘉勉。言语之间好像有点批评我们不该以顶撞态度对待督察处和《湖南晚报》，意思好像说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真是岂有此理，我和大纯态度也不和缓，当场就顶了



1940年申洋文南开大学毕业证书（虽毕业于西南联大，但发证以入学学校为准）

回去。我们也给他出道难题做做，问他，北大某教师个人行李装藏经的皮箱因被司机藏了鸦片，被督察处没收，要不要请他陪我们一道去交涉索回？他赶忙说不能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我们也没有去督察处依法索回那只箱子。我们说，我们的押运工作，把三校全部公物基本无缺地运回平津，这“基本”二字就代表除了北大一箱私人文物和清华一箱公物（见下文）之外，其余公物全部完整无损地回到所属学校了。

七、刁难、勒索和滞留

我本来对长沙这第一次事件作了极坏打算：督察处和《湖南晚报》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可能对我作进一步迫害，因此我要做好准备。我天天对事态发展作详细笔录，并把笔记本藏在床褥底下，并告诉王大纯如果发生意外，他可找到笔记本准备打官司。大纯以玩笑口吻说：“你真厉害。”完全出乎意料，督察处和《湖南晚报》再也没有碰我们，可能是我们在大报上的大号字启事广告起了威慑作用，再看我们没有油水，也就不来撩拨我们了。尽管如此，督察处在检查上做文章是不肯放松的。首先是要逐箱检查我们在长沙存仓待运的公物。裕和公司租用了一大间仓库，储存着几十车的公物。我们先去视察了仓库情况，见公物木箱堆码得如山高，我们很高兴，如果督察处不怕麻烦坚持开箱检查，我们愿意奉陪。又出乎意料的是，在约定检查之日，来了一位年青英俊的军官，谈吐有点儿知识分子味道，通情达理，态度极好，几句话就谈投机了。他说你们学校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例

行公事一番。结果他在浮头上抽查了几箱公物便算检查完毕回去交差了。至今我对此人还有很好印象，可惜没有和他交交朋友。这一关就算容易地过去了。

第二桩要检查的，是今后再来的车，一律要逐车逐箱检查，而且还拿出一套缺德的办法，在长沙西部公路入口处专为三校公物汽车设一个新检查卡，弄一批地痞流氓守在那里，一有三校公物车到达，就拦截住，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会同检查。不准我们带人去卸车装车，而是必须由他们的人来卸车和检查后装车，由我方按他们的规定付给劳务费。当然还不免要暗中勒索一些买路费。这些费用，当然我们三校人员是不管的，按承包章程应由裕和公司负责，所以这份差事留给陈毓善去做。好在他对旧社会的一套行当全懂，由他去办我们放心。

按理说，我押运的是最后一批车，是殿后的，后边不该再有车来了。其实不然，我



1983年，西南联大在天津校友联合清华、北大、浙大、燕京等校在津校友创办了一所民办大学“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公推黄钰生先生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这所学校里建立了五大学校友联络处。申泮文曾兼任天津联大的第二任校长。图为天津联大中的西南联大人参加清华建校80周年活动，右3为申泮文

□ 回忆录

到长沙之后，统计尚有二十几部车未到，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半路车坏了，屡修不好，车主亏累不堪，途中滞留的；有的是车主又承揽了别的运输任务，把三校公物存在途中老百姓家，又去拉别的脚；有的是车主不好好经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穷光了身子，把车卖了，致三校公物流落途中不一而足。有的车主比较老实，虽然遇到困难，耽误了时间，但最后仍把车开到长沙。所以在我到长沙之后，仍断断续续有三校公物车开到长沙。我们后来就为等这一部分尚待完成任务的车的到来，犹如守株待兔，在长沙滞留了整个冬天。这一批后来的车当然都得接受长沙督察处的检查勒索，我们从此也都对罪恶的旧社会加深了认识。

八、一波又起

在长沙，冬天多雨而且阴冷，寒意刺骨，街道上泥泞不堪，老百姓打着雨伞拖着高脚木屐，在路上嗒嗒地走着，全街声响是那么令人感觉单调和烦躁。没有公物汽车到来的时光，我们只好留在宿舍里烤炭盆火聊天。我和大纯都因烤火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昏倒过。就在此时，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在1946年12月中的一天，驻长沙的宪兵十五团团部派人到青年会来通知我们，有一车三校公物，司机私运鸦片，被该宪兵团截获，已将人、车扣留在该团部，须开箱检查起赃，请我们货主前往会同检查。我们已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现在又出来一件新鸦片案，确实令我们又大吃一惊。我和大纯只好硬着头皮赶忙前去。首先看到该团的曾团长，他态度很客气，谈话间还互相拉拉关系，原来他是天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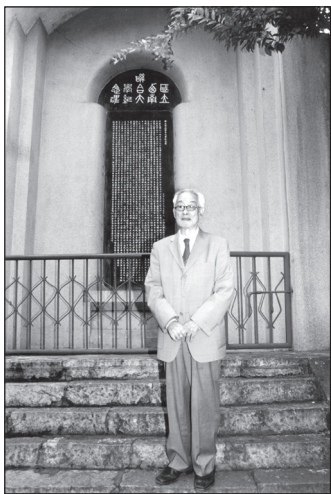
开中学早年的毕业生，自然我们就赶快拉紧这份校友关系。大纯是足、排球健将，曾团长也是体育运动迷，越谈越投机，谈得入港时，这位性格爽朗的团长毫无顾忌什么都讲。还是一样，这部卡车司机在昆明一买入鸦片时，告密信息就很快通知到长沙。不过这次信息没有传到督察处，而是传到了宪兵十五团。这都是发财机会，为了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宪兵十五团派出队伍到督察处所设关卡之外的郊区守候，把这部汽车截获，押解到宪兵团。谈够了情况，就着手卸车开箱检查。这一车公物都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仪器设备。没打开几箱就把鸦片找出，整箱公物被盗空，装满满一箱油纸包的黑色烟膏。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见到鸦片烟膏，无人指点是不会认识它的。检查完毕后，宪兵团长即着人开车把公物全部送到我们存仓地点交给我们点收。我们对此事件解决得如此爽快和顺利，非常满意，没想到这里又会有“福兮祸所伏”，竟会弄出人命案来。尽管宪兵团曾团长对我们貌似信任，互相交谈很亲切，但不知为什么又对我们的人有某种怀疑。前面已介绍过，北大的单溥和清华王树才，为了自由方便，二人住在外面小旅馆里。岂不知第二天夜里宪兵突击搜查了他们住的小旅馆，对他们二位翻箱倒柜搜了个彻底，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但王树才当时因只有三校押运员证明书而无复员证明书备受盘查，遭受惊吓，精神积郁，一度失踪。我们只得于12月20日在长沙《中央日报》登出寻人启事，寻返后精神失常。后来，我们去到岳麓山清华大学驻长沙办事处联系，希望他们肯于接待王树才到那里去养病。那里一听是精神病，便严辞拒绝，怎么也不肯接

受。眼看王树才一天一天萎缩下去，我们也十分着急和担忧。

最后为了合理解决把王树才尽快送回北平交给清华大学去照料，我们与裕和公司商妥，先安排已集中在长沙的公物装船北上，三校一方由单溥押运，裕和公司也派二人同行，共同照料王树才北归。这就作为一项紧急任务安排了。开始是一切顺利的，在长沙公物12月下旬在湘江畔装船启运，随后陈毓善从武汉打电报回来，说已将公物顺利地装了江轮从武汉启运了。不料在长江途中，单溥从轮船上发来电报，说在离开武汉的第二夜，王树才上厕所，避开监护人，从厕所窗子跳出投江了。这是我们三校公物北上途中不明所以损失的一条人命，收到电报不胜哀伤。王树才，江苏籍，为人老实谨慎，忠于职守，为押运清华公物受尽辛苦。想不到刚刚迎来八年抗战的胜利不久，却成了旧社会的牺牲品！

九、风浪过去了

送走了单溥押运的公物后，大风大浪



二〇〇三年九月申泮文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前

算是过去了。但仍有约十几部卡车公物滞留途中，我和大纯留下来就是为了扫这个尾。看来不能再“守株待兔”了，我们决定动身回到中途站贵阳去查找。但我们商定一定要明确这是裕和公司的责任，应由他们主办，我们监督协助。所以我们打急电给裕和公司吴经理，以严正措词，要求他来贵阳与我们会面，切实负责做好查找失落公物的工作。1947年3月初，我们二人由长沙乘汽车去贵阳，吴某从上海乘飞机回昆明然后乘汽车来贵阳。吴某是个帮痞头子，挂上个总经理名义，利用三校运费在上海做生意又开了洋荤，所以趾高气扬，对我们把他呼来喝去甚不高兴，板着个面孔来会面。我们和他讲合同、论道理，他也理短，不能不照办。后来还是通过他的各种线索，跑了几个乡县，把失落在途中几车公物一一找到，由裕和公司再雇车运回长沙，这时大约已到1947年4月底了。

我和大纯二人押着最后一批公物，经武汉、上海而天津，回到天津已是1947年7月中旬。别离天津整整十载，风景依然，只是在日军长期占领之余，繁华程度大大退化。回到学校，见到同事们和亲友们，都不胜今昔之感。

公物用海轮装到天津后，由裕和公司把清华、北大公物转包给脚行，运到天津火车站存仓，等待装上货车启运北平。记得还是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先生，他说，弄车皮还得我亲自出马去办交涉。他带着我去北站天津铁路局，向有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关照，才拨到车皮，使清华、北大二校公物顺利装车运回北平。我在7月底去北平交差，我们押运任务至此胜利结束，为三校的复员建校，尽了我们应尽的努力，也算作出了小小的贡献。